

浩气长存 碧血丹心

吉鸿昌的非凡人生

●张耀元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公园的吉鸿昌雕像。

行走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一栋红色小楼映入眼帘，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红楼”，这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故居。旁边的中心公园，伫立着一座吉鸿昌的雕像，手持长刀，立马远眺，目光坚定，仿佛诉说着自己从爱国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坚定不移英勇抗日的一生。

郑重承诺：“作官即不许发财”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其父以开小茶馆为业，家境贫寒。吉鸿昌常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听南来北往的爱国志士纵谈天下大事，自小便浸染了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3年，吉鸿昌在冯玉祥部入伍。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屡立战功，所带领的第十九师能征善战，获得了“铁军”的称号，“吉大胆”的威名声震遐迩。

1920年5月，吉鸿昌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殷切叮嘱：“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吉鸿昌谨记在心。

回到驻地后，吉鸿昌把“作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分发给全体官兵，共志廉洁。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1929年，吉鸿昌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时，一位回民老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想求他办事。他本想拒绝礼物，又怕老人误会，便收下礼物，到厨房安排饭菜，热情款待老人。临走时，吉鸿昌用自己的津贴，按照当地物



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

资料图片

价的两倍，把钱放进老人包袱里。老人要求的事情，他令人详细调查清楚后，予以解决。吉鸿昌住所简陋，家具陈旧，他却从不抱怨，只是常说：“我们是为人民打仗，不是为了享受。”他不讲究吃穿，常常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关心体恤军中战士。一次吃饭时，吉鸿昌发现一名士兵愁眉不展，询问后得知是其母亲生病了，但家中没钱抓药。吉鸿昌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士兵手里，说道：“老人的病要紧，这钱你不要推辞。”并嘱咐士兵以后有难处，尽管来找他。

“作官即不许发财”，这是吉鸿昌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清廉作风的真实写照。他也以此教育子女，传承刚直清正的家风。吉鸿昌的子女从未有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其子吉兰泰是一名普通教师，为人低调，兢兢业业。其女吉瑞芝曾说：“‘作官即不许发财’是吉家子孙传承的座右铭，不管做什么事，不是我们应该拿的，我们绝对不拿。”

加入共产党：人生的重要转变

1930年9月，吉鸿昌部被蒋介石收编，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命令，被蒋介石解除军权，强令出国“考察实业”。

正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当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并立刻发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但国民政府坚决不允许，吉鸿昌被迫上船。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毅然终止“考察”，回到祖国。船行至上海，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历经艰辛，他找到了共产党组织，坚定表明自己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入党。经过党组织的考察，1932年秋，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吉鸿昌由一名爱国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入党后，吉鸿昌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联系

各地抗日武装，于1933年在党的指示下担任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当时，面临枪支弹药严重不足，他让妻子变卖家产，拿出6万元用于购买武器，并冒险闯过重重关卡护送到前线。1933年7月，吉鸿昌亲率部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成功收复军事重镇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城镇，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人生豪迈：“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4年5月，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转入天津开展地下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吉鸿昌全身心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开展抗日活动。他参与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担任主任委员，还和宣侠父等人一起创办、出版了抗日刊物《民族战旗》。于是，他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住宅，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开展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红楼”。

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吉鸿昌对住宅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每层都设有一间小密室，以应对紧急情况，并在阁楼处配备秘密印刷所，印刷党的秘密文件和抗日刊物。“红楼”内还有一个秘密仓库，储存筹资购买的军火。

吉鸿昌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遭军统特务暗杀，而后受伤被捕。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将吉鸿昌“就地枪决”。

殉难前几个小时，吉鸿昌向敌人要了笔墨和信纸，写下一封正气凛然的遗书，之后从容走上刑场。他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要求搬来椅子坐下，并让刽子手从正面开枪。临刑前，他以大地为纸，枯枝作笔，写下了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牺牲时，吉鸿昌年仅39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1971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1984年，吉鸿昌牺牲50周年，聂荣臻评价他说：“吉鸿昌烈士是民族英雄，将永垂不朽。”

而今，吉鸿昌居住过的这栋红色小楼依旧屹立，它不仅承载了历史长河中的革命记忆，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2年7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红楼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1月，在吉鸿昌诞辰百年之际，和平区在红楼前竖立起吉鸿昌雕像。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吉鸿昌用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英雄壮歌。

晴空一鹤排云上

鹤文化及其艺术演变

●姜兴达 孙继梅

又到了“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季节。说到秋季典型物候，人们几乎很难想到鹤。其实，古人把鹤与秋天联系在一起，是颇有道理的。

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鸟类的迁徙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在我国东北和俄罗斯等地生活的鹤，往往要在这个时候回到黄河流域。在黄河湿地，它们可以安心繁殖、过冬。这便让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诗人看到了秋天白鹤冲上云霄的场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在动物里占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被视为祥瑞、长寿的象征，寄寓着人们美好的理想与愿望。

鹤往往是传说中神仙的坐骑。《相鹤经》里写道：“（鹤）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拾遗记》中说：“群仙常驾龙乘鹤。”在殷商墓葬的雕塑上，就有鹤的形象。

古人早就发现鹤善飞。在飞机出现之前，鹤作为可以出入云端的鸟，无疑是古人眼中可以沟通天人的仙鸟。众所周知的丹顶鹤，飞行高度在5000米以上，而灰鹤的飞行高度接近万米，迁徙途中能翻越喜马拉雅山，在所有鸟类中名列前茅。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和二郎神有一段精彩的斗法。当孙悟空变为水蛇后，二郎神就变成了一只可以吃蛇的“朱秀顶的灰鹤”。而这也是二郎神在这场逐渐升级的斗法中变化的最后一种鸟。由此可推断出鹤在鸟中的段位。在传统文化中，鹤堪称鸟类中最高贵的一种。仙鹤被称为“一品鸟”。在明清时期，皇帝穿龙袍，一品大员穿“鹤袍”。最常见的是“鹤立潮头”与“仙鹤飞翔”图样，仙鹤在云里飞翔的图纹象征“一品高升”“指日高升”。

杜甫在《观李固请司马东山水图》中说：“王乔鹤不群。”他所说的王乔，也叫王子乔，是道教中的一位仙人。他本是周灵王的太子，原名叫姬晋。根据《列仙传》记载，王子乔在游历时遇得道高人，被接上山嵩山清修。许多年以后，他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家人：某年七月七日，在某地等我。到了那天，他骑着白色仙鹤而来，停在山巅上可望而不可即之处，向家人挥手致意，然后乘仙鹤离开，从此得道升仙。此后，仙鹤就成了仙界中流行的座驾，在《西游记》中，仙鹤是神仙中最常用的坐骑。

在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道教把鹤视为神仙的化身，认为它是上天的使者。鹤实现了从自然动物到神灵的转变。道士被

称为“羽士”，道士的袍子被称为“鹤氅”。民间常说的“驾鹤西去”，本指修行圆满之人得道成仙。

历代文人雅士创作了许多以鹤为主题的作品。在《诗经》中，咏鹤的诗就有两篇。著名的“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用鹤来喻指隐居的贤才。鹤“声闻于天”的特点，既比喻人的才能，又说明了鹤的声音之高亢。因为鹤的声音尖亮，人们还用“风声鹤唳”来形容陷入惊慌恐惧、自相惊扰境地的中国。可见鹤的叫声颇有特点，令人过“耳”不忘。鹤的叫声嘹亮，在旷野中可以传到四五公里之外。这要归功于它特殊的生理构造。鹤的气管很长，不仅藏于脖颈之中，还在胸骨里盘绕。鹤类延长的气管能像铜管乐器一样增强发音时的共鸣。

魏晋文人经常以鹤来自喻，认为自己就像闲居旷野不被重视的野鹤。阮籍《咏怀》中有“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即便心中苦闷，诗人依旧想通过身处云间的玄鹤表达独立的姿态。

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背后有一



“全民植树 治理河山”宣传画

个关于黄鹤的传说。据明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三国时费文祗到辛氏酒馆饮酒，辛氏待他很好。为回报辛氏，他在墙上画了只黄鹤，此后有客人来饮酒，黄鹤就从墙上下来舞蹈。来饮酒的人越来越多。10年后，辛氏“家资巨万矣”。一天，费文祗又来到酒馆，吹笛把黄鹤从墙上召下来，乘坐黄鹤飘然而去。辛氏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建了黄鹤楼。这个传说让我们想起画龙点睛的故事。无论是龙，还是黄鹤，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让人们更愿意相信传说的真实性。

传统音乐中也有不少以鹤为题的名篇。鹤以善鸣著称，在传统音乐中，主要表现鹤的高洁情操。古琴曲《鹤鸣九皋》即根据《诗经》而作，通过悠远的弦音塑造鹤高洁的形象，使人闻之思“高歌狂吟”。《双鹤听泉》曲调空灵缥缈，将听者引入清幽林泉之间，在悠然自得中生出超然世外的体悟。另有《猿鹤双清》，略显轻快的曲调展现了猿鹤的高洁品质与仙风道骨。

北宋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六，上元节次夕，天清气朗，汴京上空群鹤飞来，盘旋宫殿上空，久久不肯离去。这让宋徽宗赵估产生了“仙鹤告瑞”的幻想。他欣然命笔，将目睹的这一幕绘于绢素之上。一幅千古名作《瑞鹤图》就此诞生。

在题画诗中，赵估以瘦金体记述了事件原委，他在诗中将群鹤与古代经典中提到的闻乐起舞的祥鸾，汉武帝出海捕获的赤雁相提并论。他还特意强调了鹤与长生不老的关联，将它们与蓬莱仙山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寿命能够长达千年。

虽然赵估的祥瑞之愿难免落空，但鹤确实是一种长寿的动物。人工饲养的丹顶鹤能活到70多岁。这相对于古人的平均寿命，实在是可观了。

明代边景昭的《竹鹤双清图》将三棵劲挺的老竹错落于两只仙鹤之间，展现了古人心中鹤坚贞的爱情观。清沈铨的《双鹤图》、华岛的《松鹤图》、虚谷的《松鹤延年图》等，都是松鹤延年的主题。

到了现代，传统的文艺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吕澂、康有为等人在绘画领域提出“改良”思想。鹤主题的绘画也有所变化。在林风眠创作的《群鹤图》《双鹤图》《白鹤》等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画白描的影子，又可以感受到西方速写技法的影响。《群鹤图》由几只立于广袤水草的白鹤构成，它们姿态各不相同。与鹤之闲

儒家以“三代（夏商周）”为小康社会的理想，主张“以礼治国”。礼的本字是“豊”，在甲骨文那里象征着人们击鼓献玉以敬奉神灵。《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春秋时期，孔子通过总结和反思“三代”的礼文化，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使礼衍生出其他一些功能，进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这概括出礼在社会层面的基本功能。

什么是“定亲疏”？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由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所构成的伦理社会。大体上，古人既不是基于彼此的利益关系，也不是依据个人的偶然喜好，而主要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古礼中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丧服制度。它规定了死者去世后，亲属朋友为其所穿戴的服饰，且这些服饰体现了等级上的差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父子、君臣、夫妻是古时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体现在丧服制度上就是子女为父亲、臣子为君王、妻子为丈夫都应该服最重一等的丧服，即斩衰服；次一等的丧服被称之为齐衰，意味着与死者是次一等的关系，如兄弟姐妹之间、叔伯与侄子之间。

再次一等的丧服是大功服，如堂兄弟之间相对又疏远一些的关系；更次一等的丧服是小功服，如外孙为外祖父母、外甥为姨母等；最轻的丧服是缌麻服，如女婿为岳父母以及表兄弟之间。

什么是“决嫌疑”？古人对这个词的用法和今人稍有不同，而是将嫌与疑区分开来，即决嫌是借助礼来避嫌，决疑是通过礼来解决相关的疑问。儒家提倡，面对新出现的具体情况，人们可以根据礼意进行类推，从而形成新的礼。

什么是“别同异”？这就涉及如何处理与家庭中两类女子的关系：

一类女子属于“本同今异”，指的是姑、姊妹和女儿。由于这些女子曾经跟自己是一家人，属于“本同”；出嫁以后成为另一家人的媳妇，则可视为“今异”。当这些已嫁女子再回到娘家，与父兄交往时，就不能跟以前那样了，应该讲究男女有别，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另一类女子是“本异今同”，包括伯叔父的妻子、兄弟的妻子和儿子的媳妇，俗称婶娘、嫂或弟妹、儿媳。这些女子与自己本来没有血缘关系，属于“本异”；后来嫁进来才成为一家人，这就是“今同”。

什么是“明是非”？其实，任何时代都有某种是非观念，问题在于评判是非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却主要依据个人的利益或感情来定。古人通常将礼作为判定是非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凡是合乎礼的就是正确的，违背礼的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明是非”。

在中国古代，礼不仅承担上述社会层面的功能，还承担许多政治功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畿服制度、爵位制度、土地制度、贡赋制度、军政制度、刑法制度、职官制度等，都属于礼的范畴。

其中，礼与法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管子》中有“法出于礼”的说法。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古代法律逐渐实现儒家化，即儒家所主张的礼仪上升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原则。

正因为如此，《春秋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从政治的角度概括了礼的功能，即具有治理国家、使民众保持一定秩序的政治功能。

然而，到了春秋中晚期，周礼崩坏了。这不仅意味着那一套烦琐复杂的礼仪规范遭到破坏，还意味着背后的精神受到挑战。有鉴于此，孔子作《春秋》，对周礼进行改造，即通过削弱周礼中“敬”的方面，而将一种新的精神，也就是“仁”，贯注到周礼之中。

仁，首先体现为一种亲亲之情。随着个体家庭从宗族中解放出来，其内在的亲亲之情摆脱了宗法的约束，而表现为后世中国极重视的孝道。用《礼运》的话来说，就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子女得以尽孝于自己的父母，父母也能尽爱于自己的子女。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定义非常多。但就其外在表现而言，不外乎一个爱字。这不仅包括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即一种基于血缘亲情而近于自然情感的仁，也包括朋友、君臣之间那种带有社会性的情感。到了宋代，儒家甚至非常推崇“万物一体”的情感。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仁了。

关于礼与仁的关系，孔子也有不少表述。《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仁，那么礼不过是虚文，流于形式而已。

还有弟子问，何为“礼之本”？孔子答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无论是丧礼还是祭礼，外在形式的完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在的真情实感。



北宋赵估《瑞鹤图》(局部)

适姿态相对应的是随风浮动的芦苇，它们在风的吹拂下虽然形态万千，但并不杂乱，在总体偏暗的色调中显出和谐之义，并与白鹤的姿态交相呼应。

《双鹤图》表现了鹤的轻盈姿态。两只鹤的步伐保持一致，既展示出闲适自得之感，又包含着相互交际时的柔情。林风眠笔下的鹤，显然没有古代绘画中仙风道骨、富贵长寿之意，与写意之鹤相比，其作品里的鹤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形塑出强有力的现代语言。

在一幅“全民植树 治理河山”的现代宣传画中，林下是扛着树苗和铁锹的劳动者，远处则是人们植树的场景，而两只飞翔的白鹤和十分粗大高耸的松树十分醒目地占据着画面的主要位置。在优美的环境里，鹤成为绿水青山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画家林风眠笔下的鹤，还是现代宣传画里的鹤，都表现出对古代之鹤的“形象重构”，和对现代之鹤的“理念重塑”。

从自然之鹤到神仙之鹤，再到自然之鹤。如今，鹤的身上既蕴含着古老的文化信息，又加入了崭新的环保理念。这些无疑为现代艺术家提供了更加丰厚的创作土壤。



林风眠《群鹤图》



清乾隆文官官补之一品仙鹤纹